

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

路 滔/著

徐州会战纪实

团结出版社

• 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 •

血 红 的 焦 土

——徐州会战纪实

路 滔 著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DJ85 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红的焦土:徐州会战纪实/路滔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5.1

(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

ISBN 7-80061-589-8

I. 血… II. 路…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256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1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360 千字 印张:14.75 插页:4

ISBN 7-80061-589-8/Ia · 291

定价:17.40 元(平)

内 容 简 介

该书为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之一。中日徐州会战，又名鲁南会战、台儿庄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场既悲壮辉煌而又令人遗憾的战役。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徐州会战的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以恢宏的气势，第一次真实而又完整地依次描述了1938年发生在鲁南、徐州一带的那些曾经震惊了世界的浴血场面——滕县保卫战、临沂阻击战、台儿庄大血战、徐州大突围等；第一次生动地刻画了李宗仁、白崇禧、张自忠、庞炳勋、孙震、王铭章、孙连仲、池峰城、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濑谷启等一大批中日高级将领形象，并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令人掩卷难忘。作品资料丰富，笔力遒劲，情节曲折，既有双方将帅的斗智斗勇、运筹帷幄，又有百万大军在战场上血溅焦土、刀光剑影的拼死搏杀，通篇洋溢着“共赴国难，爱我中华”的激昂、悲壮气氛。

封面照片：增援台儿庄的中国军队之一部迅速奔赴前线。

环衬照片：攻入台儿庄的中国军队与敌人展开巷战。

前 言

1945年,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到1995年,抗战胜利已整整50周年了。回顾过去那场4万万5千万人民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千千万万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先烈们的崇高致意,特编辑出版这套《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献给今天的10万万中国读者,以示我们对先辈的深切怀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回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国内困境,按照他们侵占中国的既定国策,蓄意挑起侵略战争,逐渐侵占了我们东北;然后经过几年准备,又于1937年7月~8月从华北、华东向我国广大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疯狂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敌,团结奋战。侵略者不但未能灭亡中国,反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蹂躏和欺凌。一年年割地赔款,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逐渐衰败为“东亚病夫”;一次次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都归于失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取得完全胜利、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它结束了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武装侵略斗争中屡屡失败的历史,洗刷了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耻辱。它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象征,是东方文明古国重新崛

起的转折点。

应该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取得的。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且领导或协助一部分爱国军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争。而此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进行破坏。无疑地，这对日本侵略者以后肆无忌惮地侵占整个东北，乃至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937年7月，日军又逐步侵入华北；8月又从上海发动进攻，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3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10月，华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战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等，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迫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前进，使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被迫实行抗战，政治上一贯限制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抗日活动，反对发动人民群众，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御方针。此后，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面对日寇在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开辟广泛的敌后战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歼敌方法，大打人民战争，使抗日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和蓬勃

发展。而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于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协同日本军队进攻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也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1944年起，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形势好转，八路军和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我东北抗联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各地部队投入全国规模的反攻。14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共作战12.5万多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7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作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其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达600余万人。敌后军民以高度献身的精神坚持抗战，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国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无须否认，在面临强寇侵略、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鼓舞下，奋起抗战，在他们身上，同样表现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抗日义举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国民党爱国官兵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勇抵抗日寇侵略。在东北，马占山愤举义旗，被当时外国舆论称之为国民党上层官吏中“可堪称道的仅有的一人”。长城抗战、卢沟桥抗战，张自忠、赵登

禹、佟麟阁及其所部爱国官兵，在千里长城线上，不畏日寇的猖狂进攻，顽强抗击，在“七·七”事变前后，面对敌人的蓄意挑衅，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和英勇无畏的武装抵抗。在日寇进攻华北和华东，挑起亡我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的情况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战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宣布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当时国民党军队有200余万人，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蒋介石和国民党此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其军队先后组织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仅1年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就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和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国土，不仅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对日作战越来越显得消极被动。日本侵略者也把主要进攻重点转到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从1939年至1941年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发动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进攻战役，如南昌战役、随枣（湖北随县、枣阳）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湖北枣阳、宜昌）战役等。这些战役除三次长沙作战外，都只是在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才显得激烈，又往往以日军停止进攻即告结束，国民党军队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士气低落的态势。当1944年4月，日军向豫、湘、桂等省发起“一号作战”的战略性进攻时，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至12月国民党当局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146座城市和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给6000多万同胞造成深重的

苦难。尽管如此，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的积极抗战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重大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承受了日寇的重点进攻。淞沪会战作为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坚持达3个月；忻口会战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战役，是华北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曾经震惊世界；武汉会战作为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也是双方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战略相持阶段，组织的三次长沙会战，仍是国民党军队此前少有的用武力迫使进犯之敌回复战前态势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敌人一次次展开殊死血战，多少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过1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役100余次，小战斗1万余次，共有200余万名官兵阵亡，其中有上将军官8名，中将军官41名，少将军官65名，校尉级军官17000余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团结御侮，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英雄颂歌。

值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该系列突出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团结抗敌的历史，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努力抗战，尤其是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敌，也做了客观、真实的反映。它采用纪实文学的体裁和全景式、多角度、大场面、多风格的表现形式，深刻而全面地记述在抗战的前线和敌后各个战场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战斗和重要的历史事件，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出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一幅幅英勇悲壮的历史画卷，揭示了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揭示了国共合作、民族团结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卓绝的

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 2100 万以上，财产损失和战场消耗达 1000 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约 600 亿美元。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热诚希望广大读者能了解中国抗战的历史，了解抗战的胜利乃至今日中国的发展，是多么来之不易。该系列的出版，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纪念抗战，缅怀先烈，让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促进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中国抗战大写真系列》编委会

1994 年 12 月

引 子

我与《血红的焦土》

(1)

绝非夸张，打从我记事的第一天起，东洋人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魔鬼！

这种“恨”，当然不是天赋，而纯粹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心地十分善良的老人，自然而然地“灌输”给我的。她，就是我的母亲——一位从8岁起就在日本人开的丝厂里“打茧子”（缫丝）、15岁时就已是个技术十分娴熟的上海纺织女工。

母亲的一生，勤劳善良而又命运多舛：仅在抗日战争中，她那从8岁当童工起开始拼命积攒的那个“家”，就曾先后被日本人的炸弹完全彻底地、毫不留情地焚烧过两次。用母亲自己的话讲，“每一次都是烧得连根筷子都没拿得出来啊！”

第一次挨炸，发生在1932年“1·28”淞沪抗战中。当时，我家住在上海闸北。1月28日晚，日军突袭闸北后，又派遣一群群涂着“红膏药”徽记的轰炸机，冲向了和平居民。只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先是几幢楼房冒烟，紧接着，便是一片“棚户区”起火。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望着虽不富庶但毕竟是自己耗了20多年的心血筑起来的窝，转眼之间化作了一缕青烟，母亲发疯般地哭着，喊着，悲痛欲绝地瘫倒在冰冷冰冷的石子路上……

是因为哀痛过度？是因为悲忧交加？是因为营养缺乏？是因

为愁肠百结？……反正，第二年——母亲才刚满 32 岁，竟已是一头如雪的白发！

第二次挨炸，发生在 1937 年“8·13”淞沪抗战的第二天——8 月 14 日。那天，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顿时，大上海成了一个“大火海”，“大血海”：烈焰腾空，墙倒屋塌，残肢断头，触目皆是，景象之惨，无以复加。当时，我家住在恒丰路，一位老邻居至今还记得：那天大轰炸后，母亲站在弄堂口，望着冲入云端的烈焰，望着无情的烈火又一次一古脑儿地吞没了她的栖身之地和全部家产，竟然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失神地久久站立着，眼泪流满了双颊也不去擦一擦，像是一具木偶。十多分钟后，她把一副银手镯——这个人间赐予她的唯一的财富，放进了幼子的口袋里，又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脸，然后默默无语地、直端端地朝着熊熊的大火走去……

她执意与她的家同焚！

“凤子，你不能这样啊！……”我的二婶猛然醒悟，带着哭腔大吼着，随即飞快地奔上来，一把抱住了母亲的后腰……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据目睹过这场大火的老人讲，那天从火中逃出来的烧伤者不计其数：有的烧掉了两只手，有的烧残了一条腿，有的满头秀发被烧得精光，有的半边脸被烧得焦黑……

战争，对权贵、富豪来讲，也许只是意味着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暂时塌了一只角或是几只角——他们有的是权、有的是钱。据抗战初期的上海有关报刊记载，即使在震耳的爆炸声中，那些太太、小姐们，照样可以喝到香港的牛奶，照样可以穿“西尔蒙”华衣，照样可以精心地涂抹价格昂贵的“蔻丹”指甲油。但是，战争，对一切身处最底层的、不幸的母亲们来讲，则绝对意味着是苦难，是辛酸，是戳心剜肝的天顶之灾！

我，我的女儿，乃至我的女儿的女儿们，怎样才能永远根绝这种“天顶之灾”呢？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一个原因。

(2)

岁月的流逝像水一样，常能淘光许多有价值的记忆。

上海市胶州路小学，曾是留下我童年时代无数笑靥的母校。记得在50年代，从我家到学校，需经过一条极为普通的小弄堂——晋元里。从晋元里北口穿进去，拐两个弯，便能看到一座似乎并不被人关注的坟墓。那墓修得很气派，大圆顶从上到下全是用优质水泥精心浇注，就连四周地面，好像也是用水磨石铺设的。圆墓之北约一二米处，矗立着一块长方形墓碑，墓碑上端的大理石上，镶嵌着一个戎装笔挺、英气逼人的军人头像。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阔绰的坟墓四周，渐渐被高高矮矮、灰灰黑黑的各式各样简陋的民房包围了、挤迫了，使人看起来，这豪华的建筑占据的空间是那样的狭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那样的无足轻重。小时淘气，我和我的那帮“捣蛋鬼”们，常围着坟墓捉迷藏，或者坐在墓顶“侃大山”，或者忘乎所以地爬上墓碑的顶端，站在上面神气活现地抖着威风——比赛谁撒尿撒得远……

一次，路过这座坟墓时，我指着墓碑上的那个英武的军人头像，好奇地问母亲：“阿妈，他是谁？”

“国民党的一个叫谢晋元的团长。”

“为什么把他埋在这儿？”

“因为他打过东洋鬼子……”

“打东洋鬼子？”

“是啊，他领着八百壮士死守过上海四行仓库。他死后，来给他送葬的上海老百姓有几十万呢；听说，装他的楠木棺材板，足有一尺多厚！”……

“妈，他……他真的打东洋鬼子？”

“打！当然打啦！”母亲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解答着：“鬼子打上海的时候，我和厂里的姐妹们曾到闸北前线慰问过那些当兵的。

啊呀呀，走近一看，真吓人哪！——闸北稻田的那些水呀，血红血红的，尽是那些当兵的淌的呀！在一个土壕里，有一挺‘水机枪’（是德国的‘马克辛’？是中国的‘汉阳造’？是……待查）整整叫了一天，把枪管打得红通通的。枪筒里的水打干了，周围又没水，怎么办呢？那些当兵的就拼命地往枪筒里撒尿；尿撒光了，竟然又争着割开自己的血管，往枪筒里灌血！……”

我不知道母亲讲的这些是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这些话里到底有没有“艺术夸张”。但是，从感情上讲，我是完全相信母亲说的话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心地善良，从生至死73年，似乎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地故意编个瞎话去欺骗人、捉弄人。

然而，当母亲的话与后来多如蝗虫般的“革命的大字报”发生碰撞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前者。

这就是“火红的年代”里的我！

(3)

很快，大革“文化命”了，我身不由己地随着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回到了我的老家——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小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里，虽然素称“鱼米之乡”，但万千乡亲也仅能瓜菜代式地填饱肚皮而已。

村西头，住着一位年逾花甲的、与我同祖同宗同姓的“老贫农”，按辈份，我应叫他“二叔”——但我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可他呢，每逢与我照面，总是客客气气地称我“侄少爷”——尽管他明知我的父母从年幼时就都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并未当过什么老板，挂在腰带上的钱袋子似乎也从未膨胀过。据说，“老贫农”性格刚烈，平时说话没轻没重、没高没低，加之排行老二，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没头小二”；又因“没头小二”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当过兵，打过仗，负过伤，于是，他又多了一顶臭名远扬的黑帽子——“老兵痞”。

“兵痞”，面黑，肤糙，精瘦，矮小，家中极穷。记得那年已是腊月二十四了，我见他们父子三人还蜷缩在那座狭窄的、仅用着几根破毛竹支撑的茅草棚里。棚中无床，三个人完全是钻在满地铺着的稻草窝里；窝中无被——因为那床黑得早已失掉了本色的棉絮早已是千疮百孔。我环顾四周，一圈泥墙早已被烟火熏得黑咕隆咚，棚里所有值钱的家当，似乎只有那只架在几块土坯上的大铁锅——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最多恐怕也就值个2元多钱吧。

虽然穷得“比无产阶级还要无产阶级”，可“没头小二”却有个极坏的癖好——嗜酒如命。一旦三两酒下肚，他那张满嘴的黄牙被自制的“喇叭筒”旱烟卷熏得黑呼呼的大嘴巴，常常利索得像个超级演说家。

一次，我路过他那座用几根毛竹撑起的茅草棚，他正倚在门框上独酌，黝黑的面孔上已微微泛红。一见到我，他立即站起身，很热情地打招呼：

“侄少爷，你不嫌弃的话，来，喝一盅？”

我婉然拒之。

他并不介意，那裂着三五道血口子的、粗糙得像块礁石的大手，又端起那缺口的小酒杯，很熟练地小小啜了一口。接着，黑牙缝里不停地喷出一股股酒气：“侄少爷啊，别看你是个念书人，但是，人世间的有些事呀，你不懂！”

“不懂？什么事不懂？！”我高高地昂着头，面容冷漠。那时的我，虽然厌恶打打砸砸、冲冲抢抢、骂骂咧咧的“造反派脾气”，却也自以为“根红苗壮”、“才高八斗”而多少变得有些心高气傲。

他并不理会我的“不敬”，抬起那颗瘦骨嶙峋的脑袋，就像一个博学的祖师爷在考问一个童蒙初开的幼童：“请问，你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吗？”

“你？……国民党的一个大头兵，还打过日本鬼子？”我冷冷一笑，觉得很好玩。

“当然打过！”他顶真起来，那喷着酒气的大嘴一张一合，掀动的频率越来越快：“……我×他的妈妈的，东洋人的那些数不清的机关枪啊，就像在洋油桶里放200响，就像在铁锅里炒蚕豆，不停地劈哩叭啦、劈哩叭啦地响哟！那些稀奇古怪的大炮，震得人的脑门子发抖，炮声一停，东洋人就不要命地往前冲啊！……我×他的妈妈的，我们中国人——不熊！只要一碰到鬼子，就挥起大刀砍哪，砍得那些东洋人的头哟，就像一车车香瓜儿倒进了扬麦场，满地里滚来滚去呀！……”

他讲得十分投入，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

我冷冷地凝视着他，一声不吭，表面上看似洗耳恭听他的“过五关斩六将”，而内心里却是百分之百地以一种极为鄙夷的心态，在默默地玩味着一个“老兵痞”的“反动本性大暴露”。约摸过了10来分钟吧，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冷不丁地问道：“你到底在哪儿打过日本鬼子？”

“台儿庄！”他扬起那颗干枯的、光溜溜的小脑袋，眼里顿时迸射出一股喜悦无比的光：“嗨，就是徐州北边的那个台儿庄嘛！”

“台儿庄？……”

我敢向毛主席保证：这是自我呱呱落脚于这颗蔚蓝色星球以来，第一次听说我国这块雄鸡状的版图上还有个“台儿庄”！

“老兵痞”以为寻觅到了知音，更加动情地陶醉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了：“……我×他的妈妈的，那个仗打得真叫惨哪！你信不信？只要往前跨一步，就能看到五六颗东洋人的断头！一见到鬼子，谁都想把他们往死里打呀。平时，我们一个人只带五六个手榴弹，这次却都拼命带。有时候，子弹和手榴弹全打光了，就冲上去用刀砍、用嘴咬！……我×他的妈妈的，打了10多天，东洋人败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英国人，围着我们团长不停地拍照。老百姓从各地寄来的慰劳品哪，更是堆得像座山，好像这些东西就不是花钱买的……”

“够啦！”我猛然断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头，随之，又愤怒地从齿缝里蹦出了两个字：“瞎吹！”

我当时这么做，究竟是出于对他亵渎“革命教科书”的无比愤慨呢？还是出于对他那一口一声“我×他的妈妈的”反感？……我说不清。只记得，我当时横眉竖眼，火气十足，吼完后，又扬起那颗自以为是最革命的头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指着他的鼻尖叱责道：“依我看，你身上的那股反动军队里的兵痞子恶性，至今未改！你再不老老实实，开你的批斗会！”

老人语塞，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那泛黄的混浊眼珠里灌满了善良、困惑、惊恐、无奈、遗憾、懊悔……

之后，整整一个多月，这个极为复杂的眼神，没从我的印象里消逝过。

(4)

第二年，纯粹是个偶然机遇的撞击，我这个硬梆梆的“红五类”后代参军了。在大西北的一个被人们称为“清水”的戈壁小站上，一列闷罐式军列，蜿蜒着一条极为神秘的军事铁路，把我们拉到了即使在当时最新的军事地图上也寻觅不到的地方——东风航天城。后来，在这个常年遭受着狂风、沙暴、高温、严寒、盐碱侵袭的“神秘禁区”里，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了我国的原子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飞向了茫茫太空……

在这块与世隔绝的“军事禁区”里，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学毛著”自然也就成了士兵们必不可少的“主课”。

读书，对我这个全团唯一的“戴眼镜的臭老九”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个绝对称不上是“优点”的习惯——虽不求甚解，但看书极快，自吹“一目十行”。新兵连生活是紧张的，极苦，极累，但是，那厚厚的1406页“毛选”，不到一星期，竟被我一下子“啃”掉了三分之一！